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

政教系七二级部份工农兵学员

编者按：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共八万字，分两个部份，即《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和《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在第二部份中又分八个问题。本刊选登了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的两个问题。

张大伯是老工人，老王是公社干部，小李是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他们是老邻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老、中、青三人每天晚上都坚持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每逢星期日晚上，就聚在张大伯家里，交流学习心得和讨论问题。下面是他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时的对话。

《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

张大伯：《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里面讲的尽是工人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是我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我们首先应当了解这本书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小李：大伯说得对。是要先弄清楚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才晓得马克思为什么写这本书，才知道这本书是针对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的。

一、《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老王：《哥达纲领批判》写于一八七五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产物。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基本上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爱森纳赫派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准备合并成一个政党……

小李：那还行？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怎么能和机会主义派别搞组织上的合并！

张大伯：是呀，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要求德国工人阶级统一力量，共同对敌。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反对合并。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合并，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合并呢，还是在机会主义基础上合并？这可是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这就坚持了“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个原则。马、恩明确指出：如果拉萨尔派不接受这些条件，那就不要急欲合并，“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

小李：对！就是应该这样。

老王：可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西等人不听马、恩的告诫，急欲合并而放弃原则。他们背着马、恩和广大党员，与拉萨尔派的代表起草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准备合并后作为党的纲领。1875年3月，马、恩从报刊上看到了这个纲领草案，他们对纲领草案所表现的断然退步，非常愤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恩格斯写信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之一倍倍尔，指出纲领草案的错误，要求他们放弃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马克思不顾医生的劝告，抱病写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之一的白拉克写了信，并寄去《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要他转交给李卜克内西等人传观。马克思的《意见》，对纲领草案逐条进行批驳，给拉萨尔主义以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

小李：这下就好了！李卜克内西他们该抛弃纲领草案了吧？

张大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呀。李卜克内西等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一心要想获得促成合并的荣誉，对马、恩的正确批评进行抵制。他们不顾马、恩的反对，于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城召开了两派合并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拉萨尔派的代表有71人，爱森纳赫派的代表却只有56人。那个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只在个别文字上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正式作为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因为纲领草案在哥达城通过，所以称为哥达纲领。马克思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是批判纲领草案的，所以又叫做《哥达纲领批判》。

小李：很明显，哥达纲领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向拉萨尔派妥协投降的产物，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纲领。《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彻底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种种谬论，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应有的基本内容，教育和挽救李卜克内西等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人，力求使德国工人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不清楚，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是怎样来的？他们在搞合并之前有斗争没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张大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欧洲的工人运动又高涨起来。1864年，在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国际。当时的德国，一方面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阶级（容克地主）手中，封建经济的残

余长期保存，封建割据的分裂状况使国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德国的资产阶级害怕工人运动的心理超过反对封建势力的要求，所以它向封建势力妥协，并勾结起来在反对工人运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老王：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由于它的创始人名叫拉萨尔，它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称为拉萨尔派。拉萨尔是一个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他剽窃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拼凑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他鼓吹国家是超阶级的，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宣扬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自由的人民国家”。拉萨尔也是一个林彪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这个机会主义的头子，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赌咒发誓说他忠于《共产党宣言》，以利用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却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暗中勾结，出卖和扼杀工人运动，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1863年5月，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窃取了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了联合会，使其成为拉萨尔派的组织。1863年6月，马、恩就已经警觉到拉萨尔和俾斯麦的勾结，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1864年8月，拉萨尔为争夺女人在决斗中被打死。他的信徒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把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推行拉萨尔主义及其贩卖活动。

张大伯：马、恩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马、恩认为斗争的关键在于争取和教育群众。所以第一国际成立后，马、恩尽力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以便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主义，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但是拉萨尔的继承人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因此马、恩直接与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首先拥护马、恩的主张并起来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把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1867年初，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人退出了联合会，着手建立新党的准备工作。1869年8月，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为它的成立大会是在爱森纳赫城召开的，所以又叫做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出现两个派别的情况。

小李：你们讲的这一段历史，使我认识到：德国工人运动分裂成为两派，根本原因是由于拉萨尔的信徒们顽固地推行机会主义路线、贩卖德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那么，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有些什么原则分歧？为什么后来两派又能“合并”呢？

老王：这两派的原则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第一国际的态度上，拉萨尔派反对第一国际，破坏它在德国的活动；爱森纳赫派拥护第一国际，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一部分。第二、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拉萨尔派主张由普鲁士国王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爱森纳赫派主张通过革命实行自下而上的统一。第三、在对待普法战

争问题上，拉萨尔派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的侵略政策；爱森纳赫派响应马克思的号召，反对把防御变成侵略。第四、在对待巴黎公社问题上，拉萨尔派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勾结，破坏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爱森纳赫派执行第一国际的指示，大力声援法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由于两派推行着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马、恩的关怀和帮助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护，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拉萨尔派积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公开支持普鲁士王朝的侵略扩张政策，引起越来越多的工人对联合会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一边。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统一力量，共同对敌，加上德国已实现统一，两派在统一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复存在，爱森纳赫派曾经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和解或者共同合作，但都遭到无理的拒绝。到1873—1874年间，爱森纳赫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拉萨尔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组织上很快就会垮掉。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派的头子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人，为了挽救政治上的破产和组织上的垮台，竟一反常态地积极鼓吹“合并”，企图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影响，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早在1873年6月，马克思就提醒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没有接受马、恩的忠告。于1874年10月和拉萨尔派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开始谈判时，李卜克内西曾经表示：合并“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的纲领也不行。”但拉萨尔派的代表坚持要把拉萨尔的观点写进共同纲领。而爱森纳赫派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又极力主张对拉萨尔派让步。李卜克内西非常错误地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意把拉萨尔的观点写进共同的纲领，并和拉萨尔派的代表拟出了纲领草案。当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倍倍尔曾对纲领草案表示反对，但他又无原则地同意李卜克内西的要求，“把对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这样，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对合并问题和纲领草案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

小李：这些历史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是当时德国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李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一斗到底，而是妥协、调和，甚至同意把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写进党的纲领，给德国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当引起重视。

二、《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

小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虽然写成于1875年，但在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发表，一直到1891年1月，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是什么原因呢？

张大伯：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中曾经说过，如果纲领草案被正式

通过，他和恩格斯将要公开声明他们和哥达纲领“毫不相干”，“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哥达纲领通过以后，出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马、恩才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把《哥达纲领批判》公诸于世。这种出乎意外的情况，就是哥达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一方面，德国工人群众对哥达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纲领中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蠢驴们也没有看出哥达纲领的机会主义内容，反而惊慌地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的纲领来认真对待。所以恩格斯说：

“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老王：除了那种情况而外，马、恩还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除了揭露和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而外，还涉及到对李卜克内西的错误的批评。是不是要在全党公开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错误，这要看时机和条件。

小李：就是说还有一个斗争策略的问题，既然阶级敌人把哥达纲领当成共产主义的纲领而胆战心惊，那就让他们去害怕吧！既然工人群众为统一的政党的建立而兴高采烈，又在实际斗争中把哥达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那又何必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呢？对李卜克内西的严重错误，也还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说既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既要坚持革命原则，又要讲究斗争策略，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马、恩当时保持沉默的用意就是这样的吧！那么为什么一直推迟了十五年后才发表呢？

老王：这是由那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那十五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吧。马、恩在两派合并之前，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合并。但合并之后，马、恩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还是满腔热情地给以指导和帮助。由于在事实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起指导作用，所以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队伍也发展了。但是那个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在党内也要产生影响，再加上阶级敌人交替使用反革命两手，使得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又有所发展。

两派合并后不久，“江湖骗子”杜林跳了出来，他打着“革新科学”的幌子，狂妄地叫嚣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改革”，并纠集伯恩斯坦、莫斯特等人，立山头，搞分裂，妄图另建新党。当时，彻底揭露和批判杜林主义，是德国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所以马克思说：“要不顾一切，批评杜林”。恩格斯“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写了著名的《反杜林论》，迎头痛击了这股机会主义思潮。

1878年，反动的俾斯麦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非常法”。在白色恐怖下，党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苏黎世三人团”（即赫希伯格、伯恩斯坦、施拉姆）和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德国党处于危急混乱的情况。这时候，马、恩大力帮助德国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恩的帮助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贯彻执行了革命路线，有力地反击了俾斯麦的高压政策。敌人的镇压，不但没有达到扼杀工人运动的目的，反而从反面教育了群众，锻炼了人民。

党在实际斗争中，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到1890年，俾斯麦实行反革命镇压的一手彻底破产了。狡猾的敌人眼看镇压的一手不灵，又用欺骗的一手来代替，于是在这年的十月废除了“非常法”，鼓吹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

小李：原来是这样。十几年党内的斗争，使《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提不上日程。在那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使党克服混乱，集中力量同俾斯麦妄图扼杀工人运动的高压政策作斗争。为此必须粉碎党内的机会主义，这段时期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问题，不是要抓的主要矛盾。同时在“非常法”时期，也不可能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不过在“非常法”取消三个月之后，就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张大伯：这个原因就是路线斗争的需要。1890年10月，反动的“非常法”一废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党纲来代替哥达纲领。

这时，由于李卜克内西被机会主义这个“鬼”缠住了，仍不能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底决裂。他对马、恩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总想翻案。这种情况说明，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对于挽救李卜克内西等人，使德国党在制定新纲领时不重犯老错误，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恩格斯说：“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我的责任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

老王：在当时，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福尔马尔，大肆鼓吹只要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福尔马尔的谬论，不过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但是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还得到考茨基、伯恩斯坦等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连李卜克内西也谈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嚣张气焰。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内部，也面临机会主义的挑战。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和德国党，都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对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德国党的新纲领不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将严重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以当时迫切的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为了肃清从拉萨尔到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成了马克思主义战胜机会主义的重要措施，是恩格斯扔向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颗“炸弹”。

张大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是刻不容缓了，当时不仅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经过十五年斗争实践的锻炼，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有所提高。所以恩格斯说：“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达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另外，由于“非常法”的废除，在“非常法”期间不能办到的事有可能办了。总之，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1891年1月31

日，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公开发表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18期上。

老王：《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冲破阻力，排除干扰的斗争过程之后，才实现的啊！李卜克内西等人不仅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反对，而且采取组织措施，企图强行阻止《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考茨基采取软拖的办法来阻挠。恩格斯同阻挠发表这个文件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为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所进行的斗争，充分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只有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

张大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显著特点。马克思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批判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全书的正文共有四章，是按照哥达纲领草案原文的顺序逐条进行批判的。第一章批判了五个条文，第二、三、四章各批判一个条文，归纳起来就是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是：（1）批判纲领草案空谈“劳动”和“社会”的反动本质，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2）批判纲领草案只攻击资产阶级不反对地主阶级的罪恶目的，指明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的革命对象；（3）批判纲领草案中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的分配观点，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指明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4）批判纲领草案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当作“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5）批判纲领草案中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论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6）批判纲领草案中“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说明工人阶级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解放；（7）批判纲领草案宣扬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8）批判了纲领草案中“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谬论，戳穿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提出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因此《哥达纲领批判》的全部内容，也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的。

批判纲领草案中小资产阶级的分配观点，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指明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老王：纲领草案的第三个条文写道：“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这个条文集中反映了拉萨尔的假社会主义、真机会主义的谬论。拉萨尔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用不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不必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要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改变分配方式，实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就行了。马克思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这个条文，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

马克思首先指出：纲领草案中“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提高就意味着不改变原来的基础，就是说在不消灭剥削制度的前提下，搞一点改良。所以马克思说：“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变为就意味着质的变化，就是说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生产资料从剥削阶级手中夺过来，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提高”与“变为”，只有两个字的差别，却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张大伯：马克思指出：“劳动所得”是拉萨尔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因为这个“劳动所得”究竟是指的什么？不清楚。是得到劳动的产品呢，还是得到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得到产品价值，是产品的总价值呢？还是劳动新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呢？如果是产品的总价值，那不是分光吃光连老本也不要了吗？这样社会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了。如果只是指劳动新创造的那部分价值，把这部分全分掉，又拿什么扩大再生产呢？社会生产又怎么能不断发展呢？总之，没有明确的含义。

小李：马克思在批判“公平分配”的谬论时，阐明了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的范围，它是由生产资料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而所谓“公平”，是一个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为维护经济基础服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同的经济关系，不同的阶级，对“公平”这个法权概念有不同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最“公平”的。资本家们认为工厂是他开的，生产资料也是他的，工人为他劳动，他给工人工资，利润就该他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有这种所谓“公平分配”，只能有这种“公平”的法权概念。事实上任何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都把阶级剥削说成是“合理”的、“公平”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因为劳动的果实反而被不劳动的人强占去了。但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法权并不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它只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都只能有剥削阶级单方面认为“公平”的法权概念。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怎么能抽象地提“公平分配”这样的口号呢？！事实上，那些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空想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提出过各种自以为是“公平”的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都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拉萨尔的这个口号正是继承了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的衣钵。

在阶级社会从来没有超阶级的“公平”和“平等”。毛主席说：“几十年以来的老

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拉萨尔的“公平”对无产阶级是一点也不公平。无产阶级的公平和平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

老王：马克思批判了“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谬论，阐明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

马克思指出，这里所说的“公平的”分配，就是第一个条文的最后一句话，即“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句话本身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既然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那就是说也属于不劳动的人，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如果劳动所得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权利”又在哪里呢？这就表明拉萨尔所设想的是假社会主义，在这种假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事实上不可能得到拉萨尔所说的那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分配原则；另一层意思是说，听拉萨尔的胡说八道，只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骗人鬼话，丝毫也不能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马克思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讽刺。

接着，马克思从正面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理，进一步批判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谬论。为了正确地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把纲领草案中“劳动所得”这个模糊的经济概念理解为劳动产品，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品，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如一年）生产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绝不能“不折不扣”的分配给个人，而必须是有折有扣的。首先应当扣除用于生产本身需要的公共积累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扣除这几项积累基金，怎么能扩大再生产呢？拿我们公社来说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前，平均亩产八百斤左右，比解放前翻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破了千斤关，现在达到一千二百斤左右。如果我们不提留积累基金，我们拿什么大搞水利建设，拿什么买化肥，改种双季稻的种子又从哪里来，怎么能用上拖拉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啊。所以马克思说：“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

张大伯：我们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我们既不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样去掠夺别的国家，也不依赖外援。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积累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和工业。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资金的积累，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至于积累的比例，“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就是说要根据现有生产规模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规律来确定具体扣除多少。总之，要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小李：在扣除了生产本身需要的积累之后，剩下的就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这部分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要扣除用于社会公共需要的消费基金，即：“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主要是国家机关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这部分费用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是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精减机构、减少行政管理机构和厉行节约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主要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费用，这部分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显著的增加，而且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如抚恤、退休、养老等福利费用，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真正关心劳动人民出发所扣除的费用。另外，由于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世界上还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需要扣除国防费用和支援世界革命的费用。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必须扣除以上费用之后，其余部分才能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这明明是有折有扣，那里会有什么不折不扣？任何社会的分配都是有折有扣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资本主义的积累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是靠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得来的。资本积累越多，资本家就越发财，工人受的剥削就越厉害，生活就越贫困。社会主义的积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积累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用于公共需要的社会基金，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是用来加强镇压人民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决不会用在劳动人民身上。社会主义社会用于公共需要的社会基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应当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扣除的界限，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

张大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积累的性质，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谬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我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诬蔑我们搞社会主义积累是什么“国富民穷”，提出“民富国强”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作为他搞反革命政变的经济纲领，妄图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积累，恢复资本主义积累，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地主资本家私有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老王：林彪诬蔑我们“国富民穷”，从本质上看，和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积累的，都是要搞资本主义。“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说谎；“国富民穷”，是造谣。实际情况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的初步繁荣昌盛，相应地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是一致的。解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两倍，钢产量增长了一百四十多倍，其他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解放前比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在地下。从我们公社的情况看，大部分贫下中农家里，都有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之类的东西。要说“民穷”，这个“民”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民，而是不属于人民这个范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现在不能再过剥削劳动人民的寄生生活，和解放前比，的确是穷了。林彪的“国富民穷”，只能是代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叫嚣。林彪“民富国强”的经济纲领，正是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一个方面。

小李：在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起封建制的时候，法家曾经实行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农抑商政策。如象汉武帝就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把煮酒熬盐、开铜铸铁收归国营，这对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增强抗击侵略的国防实力，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代表霍光，纠集一小撮反动儒生，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国营是与民争利，是搞得“国富民穷”，要求把盐铁的经营交还给诸侯王和商业奴隶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他们妄想从经济上壮大分裂割据势力，削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便借助匈奴的奴隶主贵族的保护伞，达到复辟的目的。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把两千年前儒家的那一套破烂原封不动地搬来，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打起“为民请命”的招牌，为地、富、反、坏、右说话，给他的“民富国强”涂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油彩，只不过说明他既得了儒家的真传，又继承了拉萨尔的衣钵，是一个双料的复辟狂，不可救药的反动派。

张大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但是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就是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使产品极大丰富来实现“按需分配”；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程度。要消灭旧社会的痕迹，需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继续革命。这些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原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

老王：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相应的报酬，同工同酬。马克思说：“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

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这样，就把人们的收入同劳动联系起来，而不是同私有财产的多少和有无联系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地主再也不能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再也不能占有厂矿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就要强迫他们劳动，自食其力。“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为了实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今天的分配制度，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小李：马克思在讲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时说：“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这些话不好理解，好象我们的按劳分配没有采取什么证书这一类形式。

张大伯：马克思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即工业和农业都是国家所有制，应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存在货币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之后，就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作为他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所以马克思说按劳分配是实行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是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内容改变了，是指消灭了剥削；形式改变了，是指用证书作为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这一步，所以我们在分配的时候不是用“证书”领取消费品，而是使用货币这个经济工具。工人从国家所领到的报酬是货币工资，社员从集体中领到的报酬是按工分分配的实物和货币。但这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不论劳动者领到的是货币还是证书，都可以换取他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品。

小李：按劳分配原则虽然同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等价交换”一样，“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实践是矛盾的，因为在商品交换中，并不是每一次具体交换是等价的，只是表面上的等价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等价。比如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表面上是等价交换，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但实际上资本家使用劳动力的结果却无偿地占有剩余劳动。这就是等价原则和剥削实践相矛盾。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总是供过于求，工资总是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此在每个个别场合经常是不等价的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劳动是为了革命，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出卖的商品，等价原则和多劳多得的实践不再互相矛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按劳分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是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比较而言。但是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不是真正的、实际

上的平等。因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所维护的等价交换原则，它是以不平等不公平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这一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按劳分配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由于劳动者各方面的情况不同。首先，在体力、生产技术和熟练程度等方面有差别，因而在同一时间内，有的人提供的劳动量多些，有的人要少些；或者有的人能劳动较长的时间，有的人就达不到。这种不同等的劳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得到不同等的消费品。其次，每个劳动者的家庭情况也不同，有的供养人口多，有的供养人口少，有的毫无家庭负担。这样，即使在劳动相等，得到的消费品也相等的条件下，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实际收入和富裕程度就不一样。可见，把同一的劳动作标准的平等权利，落实到情况不同的劳动者身上，就成了不平等不公平，所以马克思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老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张大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不能完全消灭。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还需要实行，不可能立即取消。但是，既然它是“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旧社会的痕迹，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苏修叛徒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扩大差别，用“物资刺激”来偷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用“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培植一小撮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和精神贵族。在苏修党政机关中，在工业企业和农庄中，在知识分子中都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这一个垄断资产阶级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支柱，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国，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大肆贩卖“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奖金挂帅”、“物资刺激”等黑货，也正是引诱人们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我们今天实行“按劳分配”，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渐缩小直到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旧社会的痕迹，就象列宁教导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工

人、贫下中农要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特别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法权可能产生的腐蚀作用，为创造条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奋斗。

小李：对，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定要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联系起来。所以马克思在论述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之后，紧接着就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三大差别已经消灭，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社会财富极其丰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纲领草案闭口不谈党的奋斗目标，只在分配上打圈子，用“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空话来欺骗劳动人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的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最终目标，照亮了革命的前程，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

老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述，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总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我们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最终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的强大武器，是照耀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灯塔。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都妄图用孔孟之道来改变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阶级斗争没有结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今后还会出现刘少奇、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和实践，为在中国、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张大伯：马克思指出，把已变成陈词滥调的机会主义观点写到党的纲领上去，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等谬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其要害是宣扬分配决定论，反对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分配决定论就是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把分配说成是不依赖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好象只要在分配问题上作一些改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就能得到解放。这种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还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它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妄图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局限在为增加一文钱的工资上面，不去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不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剥夺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不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事实上这种谬论是为德国的反动统治效劳的。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就是说，分配是由生产条件中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所决定的，要变革分配制度，必须首先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要变私有制

为公有制，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在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为国际工人运动所接受并占统治地位的。纲领草案用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来歪曲那些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所以马克思质问道：“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的犯罪行为，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但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是几个反动派的螳螂细臂阻挡得了的，不管是拉萨尔还是孔老二以及他们的信徒林彪，都被历史的车轮碾为尘土，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管反动派愿意还是不愿意，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批判纲领草案中拉萨尔的“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谬论，剖析了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

张大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是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把有关的原理和这个核心联系起来，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精神实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但是纲领草案的起草人根本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却追随拉萨尔，把“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谬论作为德国党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四章中，分A、B两节来批判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A节主要批判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口号和为建立“国家的自由基础”而提出的庸俗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B节批判为建立“国家的精神的道德的基础”而提出的一些要求。

老王：在A节里，马克思首先对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口号进行了批判。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自由的组织。拉萨尔胡说“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根本的、天生的职能”，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道路，争到普选权，就能把普鲁士王国变成“自由国家”。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国家”，所谓用合法手段争取实现“自由国家”，就是不准用革命暴力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要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反动统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完成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作为阶级压迫

工具的国家将“自行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唯一正确的国家学说。在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出现了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剥削制度，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需要用暴力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于是产生了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剥削阶级的自由，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比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象刘文彩这样的大地主，就有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他可以私设水牢，随意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他们这些家伙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军队、监狱、法庭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就应该揭露德意志帝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号召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摧毁这样一个吃人的制度，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因此马克思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小李：那么，无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以后，自己建立的国家是不是“自由国家”呢？

张大伯：也不是。恩格斯明确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必须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的“自由国家”。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就是用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已使社会主义的苏联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修的“全民国家”，就是拉萨尔的“自由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争取“自由国家”，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搞“全民国家”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老王：自由这个概念，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所以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意思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国家自行消亡了，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只是为社会服务的机关了，自由也就没有阶级性了。恩格斯也说：“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纲领草案把“自由”和“国家”捏在一起，就象想把水和火捏在一起一样。既然只有国家消亡才能实现自由，国家与自由就不可能同时并存。马克思指出：“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这是说，当今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论它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军事专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至于那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

由”，不过是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即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自由）约束到什么程度。如象当时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瑞士，这种国家形式就比军事专制的德、俄两国“自由”，因为它搞资产阶级假民主，对“国家的自由”有某种限制；而军事专制的国家没有资产阶级假民主的限制，就比较地“不自由”。但是，资产阶级假民主对“国家自由”的限制，只是形式上、手续上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也限制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把民主、自由说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都把民主、自由当成目的，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拙劣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欺骗劳动人民。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张大伯：马克思对纲领草案关于“国家的自由基础”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国家又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社会形成一定的国家。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一定国家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迫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这种生产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国家，只能是保护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手里，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情况具体表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是纲领草案不把现存社会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这样就把国家说成是不受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可以由人们主观意志创造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拉萨尔所谓的“国家的自由基础”。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黑格尔认为，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家庭，产生市民社会，为了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出现了国家。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拉萨尔把国家说成以精神为基础独立本质，和黑格尔的说法一样，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谬论。精神、道德、自由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根本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把精神、道德、自由当作国家的基础，就抽掉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抹煞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按照拉萨尔的理论，德国的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应该永世长存了。所以马克思说：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

老王：纲领草案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目的在于美化德意志帝国，掩盖这个国家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文明国度”的社会，尽管摆脱封建残余的程度不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但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些“文明国度”中的国家形式又各不相同，德国是军事专制的帝国，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瑞士、美国等则是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对这些具体的国家，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笼统地称为“现代国家”，便是一种荒谬的虚构。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最根本的就是它们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根基，都是为维护和发展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既形式纷繁又有共同的特征，这种情况，就是国体一样而政体有所不同。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军事专制，这些都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尽管政体可以各有不同，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却是一致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被统治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它们的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纲领草案空谈“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避而不谈国家的社会基础，以及国体和政体的区别，就是为了掩盖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本质，把拉萨尔依靠“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写在德国党的纲领上。

张大伯：马克思在批判了“自由国家”和“国家的自由基础”之后，提出了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小李：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老王：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就是说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在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光辉的结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小李：为什么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大伯：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

第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它们不但有国际基础，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必然要作拚命的反抗，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

第二、“小生产者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同自发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在国家干部、工人、党员中都会产生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蜕化变质的现象；

第四、“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第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和习惯束缚着一部分人的头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因此，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老王：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在政治上，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并没有停止破坏活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将长期存在下去，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方面。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来的办法，用腐朽的意识形态不断包围和侵袭无产阶级，并在无产阶级和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在一部分党员中，在一部分工人中，在一部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都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因此，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在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而且“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在经济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因为所有制的根本改变而结束。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还在进行破坏和捣乱。一部分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还保持着小生产的习惯，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不断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农村还有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存在，也是产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土壤。因此在农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

是十分激烈的。在工矿企业，斗争同样是很复杂。张春桥同志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里指出：“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这就说明，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个单位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单位就会改变性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小李：老王谈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而且还要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为，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老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我们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

张大伯：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愿望。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新生资产阶级的某些特点，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所要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劳改”，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他们狂热鼓吹“物质刺激”，实际上是想无限制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

小李：现在，我初步明白了为什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就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

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为此，我们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我们要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我们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张大伯：现在我们继续对《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的内容进行讨论。马克思在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之后，对纲领草案提出的庸俗的民主主义要求进行了批判。指出如象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这些政治要求，都是民主主义的废话，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抄来的。这些要求只要不是属于空想的，都在德国以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里实现了。当时的德意志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军事专制国家。既然纲领草案没有勇气象法国工人那样提出变专制帝国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不应当向德意志帝国提出只有在民主共和国才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纲领草案的做法是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特别是纲领草案还保证只用“合法手段”来争取这些东西，更充分暴露了纲领草案的虚伪性和奴才相。庸俗民主派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也是一种幻想。马克思指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可能永世长存，它必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粉碎。可是纲领草案却连庸俗民主派都不如。它连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不敢提出来，反而幻想在不触动德意志帝国的条件下实现他们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这只能是一种欺骗。

老王：马克思还指出，纲领草案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它把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荒谬的。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它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经费的一个来源，决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纲领草案把国家和政府混同，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真正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占有制，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反动的。所得税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纲领草案提出征收所得税的要求，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去触动它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国家是指那个阶级专政的问题，政府是统治者采取什么形式实行专政的问题。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就会把政府的人事变动误认为国家性质的改变。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的人事变动上，以此欺骗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应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

张大伯：这一章主要是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明确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都要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简讯

我院中文、政教两系 首届工农兵学员胜利毕业

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凯歌声中，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院中文、政教两系首届工农兵学员共 259 人，已于今年二月初胜利毕业，现已愉快地回到各地，踏上了工作岗位。

中文、政教首届工农兵学员，是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于 1972 年 4 月选送到我院学习的。他们进校以后，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肩负了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任务。在学习期间，他们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坚持走“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先后到成都、重庆、自贡、渡口、乐山、温江等地区的工厂、农村和部队，学工、学农和学军。他们一方面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学习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与工农兵一道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举办了马列主义著作读书班 7 个，儒法斗争史学习班 8 个，政治夜校 2 所，参加学习的有 3000 多人。这届工农兵学员，在斗争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写出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辅导讲座材料 2 份，批林批孔文章 350 篇，评注法家著作 11 篇，调查报告、通讯、家史等 350 篇。这批文章来自工农，面向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受到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丰硕成果。

这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各地以后，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积极开展教育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